

阅读鲁迅的一点心得

□林曼叔

我向来喜欢阅读鲁迅的作品，直到现在，我经常所阅读的还是鲁迅。《鲁迅全集》我前前后后看了好几遍，越读越觉得鲁迅思想的博大精深，这是其他作家所无法比拟的。40年前，我在香港一家杂志社工作，还编辑过《鲁迅语录》在杂志上连载。直到10多年前，鲁迅才成为我研究的主要课题，先后写了《鲁迅的悲剧精神》《鲁迅与“托尼学说”》《鲁迅与中国现代化问题》《鲁迅：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的风度及其命运》《鲁迅：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追求与奋斗》等论文，对鲁迅思想作初步的探索，卑之无甚高论，只是我阅读鲁迅的一点心得。

鲁迅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存在，永恒的存在。当我们阅读鲁迅的著作，他那批判性的文字，虽然所说的是近100年前的话语，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发的，可是现在读来一样令人震撼，有如他还活在我们中间，指引着我们，引发着我们对当前社会现实问题更深入的思考。由于鲁迅思想在今天还有它深远的意义，对我们时代有着宝贵的启示，所以一直成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的最有研究价值的对象。

鲁迅有他坚定的立场和倾向，并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他独特的认识和观点；并不是是非不分，而是有他明确的是非和强烈的爱憎。在我们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他对人道主义的坚持。茅盾先生认为：鲁迅

是一个伟大的Humanist，从其思想历程和创作历程，可看到他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可以说，人道主义是鲁迅思想的核心，是他审视历史、审视世界、审视人生、审视社会、审视道德的准绳。我们从《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故乡》《祝福》等小说，可以看到鲁迅对愚昧的国民饱含泪水的人道主义关怀。从鲁迅的杂文，可以看到他对违背人道主义的社会现象和倾向作出的严厉批判，他期望以人道主义理念建造现代化的道德，现代化的人生、现代化的社会。

走出传统与现代启蒙，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是本土文化如何被“西化”的过程。我在《鲁迅与中国现代化问题》中将中国现代化分为这样三个层次：器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思想现代化。而鲁迅一直努力于思想的现代化，也就是建造人性的现代化、道德的现代化。他认为西方新思潮的意义，就在于“非物质，重个人”，“首在立人”。他相信：“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鲁迅指出，翻开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是极其可悲的，“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一直处于或“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以他疾

呼：“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也就是说要创造一个“人”的时代。我们必须“有相当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与世界协同生长，争一地位。这始终是中国现代启蒙最为重大的课题。

当西风袭来之时，轻才小慧之徒，抱枝拾叶。什么“金铁国会立宪”之说盛极一时。鲁迅就指出：“故震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者，外状固若然觉矣，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他批判：“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措置张主，辄失其宜，况乎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乎？”这些言论在今天看来，也有着警醒的作用。鲁迅所希望的是能以人类无私的爱建造现代人生、现代道德，建造一个“幸福的生活，合理的做人”的社会。惟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得以健康发展。否则，只会损害社会正常的生存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时代的动荡，政治的争斗，使中国的现代启蒙工程并未得以继续进行，自由主义被政治强权所压制，人道主义更被视为歧途。时至今日，物欲横流、道德败坏、人性沦丧，鲁迅的“首在立人”的理念具有更严肃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香港《文学评论》总编)

理解鲁迅的几个关键词

□刘春勇

打开鲁迅的世界应该深入解析的几个关键词：虚妄、多疑、坚韧、留白。我想对这几个关键词的阐释不仅关涉到对鲁迅的重新解读，对我们思考现代性也有一定帮助。

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者认为鲁迅与虚无主义纠缠不休，现在我们必须扭转这种观念。鲁迅所面对的绝不是虚无的问题，而是虚妄。

关于虚无，尼采的解释是：“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所谓“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其实就是“上帝已死”。不过，要将虚无阐释完毕，还应该加上一句话，即虚无乃是现代人对上帝/天道隐没后所剩余那个位相之僭越的后果。“僭越”奠定了人的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使得人类进入一个漫长的“无剩余”的时代——现代。在“无剩余”的现代，几乎没有能够跟虚无脱离干系。因为虚无不仅包含某种绝望的来临，同时也包含着看似完全相反的怀抱希望的理想主义。在这一点上，现代人鲁迅同样不能免除。留日时期所怀抱的理想主义同回国后认同于“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并做绝望的反抗实际上都在虚无主义的范畴当中。但是，对虚无主义的反抗必须来自内部。这条道路，鲁迅天才般地触碰到了，他说，“……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的力量。”(《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承认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其实是对“僭越”的抵抗，或者更明白地说，鲁迅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上帝/天道隐没后所剩余的那个位相，他没有去“僭越”，相反将其悬置/留白起来。尽管只有两个字的区别，但是“僭越”与“悬置”所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世界像，“悬置”打消了“极致”——极致的希望与极致的绝望——同时也取消了“终极”，因此，这个世界只是存在于“中间物”当中，于是鲁迅借裴多菲鸣叫出了他的觉醒，“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这个觉醒既非绝望，也非希望，而是对虚妄的感到。

那么，感到世界为虚妄的鲁迅对世界的认知又会采取怎样一种方式呢？他说，“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呐喊·自序》)他又说，“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四》)这种以不断否定自我而为他者存留“余地”的认知方式其实也是鲁迅的多疑思维的最根本的方式，而其根底就在其对世界之虚妄的感到。鲁迅的多疑思维方式总是同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和对他者的存留“余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很显然，与之紧密联系的这两者都同“悬置”相关。但是，这样不断的否定自我的认知方式又并不能抵达黑格尔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乐观的绝对行动之源(绝对主体)，因为在否定自我之确证，为他者存留“余地”之后，鲁迅说到，“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敷衍”显然不能比附为黑格尔否定之否定之后的绝对行动源。但“敷衍”又绝不是潦草了事，“敷衍”乃是对世界之虚妄像体认知之后的处事方式：执著于当下，从当下往未来延展，而非相反。或者鲁迅用了“敷衍”这样一个自我贬抑的词语同时表达了对现代虚无主义强大诱惑力的抵抗与自我的坚持。这情形有一点像中国的一句老话，“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们经常拿这句话作贬义使用，可是我们反过来再看看鲁迅，他的虚妄的行为(“敷衍”、“挤”)不正是这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吗？以虚无者的角度来看，这里面有着怎样的痛苦，可是从一个虚妄者来看，这里面自有执著于每一刻的喜悦与平淡。

执著于每一刻的喜悦与平淡而不是向往一劳永逸的狂喜，正是李长之所讲的鲁迅的“人得要生存”的强烈信念，这就是坚韧，也就是鲁迅所常常说的“韧”。坚韧是鲁迅所意识到的虚妄世界像在生活层面的实践，是鲁迅的实践方式。同多疑的认知方式一样，坚韧的实践方式也是建立在虚妄之上的。感到世界的虚妄与否同其坚韧的实践方式是鲁迅区别于同时代人的最为显著的标志，也是鲁迅与左联最根本的区别。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不辞时宜的宣讲“韧”的战斗，其根源也在于此。关于“韧”，竹内好是这么评说的，“鲁迅这种韧性生命里的根源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有个叫做李长之的年青的文艺批评家认为就在‘人得要生存’这一朴素的生活信念中。……这是个卓越的见解。但还没有充分、明确地指出鲁迅道德观点的核心。我想，大概可以到原始孔教的精神中，溯及到它的踪迹吧。”(竹内好《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我想这是对鲁迅极中肯的评价。不过惟一的区别在于，“人得要生存”这一朴素的生活信念对原始孔教而言是顺理成章的，对鲁迅而言是要挣扎、辗转才能取得的。

然而，鲁迅毕竟是一位写作者，他必须将这样一种多疑的认知和坚韧的生活实践转化为审美，用文字的方式呈现出来贡献给世界。那么，与虚妄世界像相伴随的鲁迅的审美是怎样的呢？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二)》中，鲁迅强调要有“余裕”、要“留白”正是其美学观的显现，而且这种“留白”的美学观是其后期杂文写作的根基。留白的写作不是剪去枝节，只留主题的写作，而是相反，留白是一种散漫性的(discursive)、将一切“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的写作。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从《台湾新文学与鲁迅》看二十一世纪台湾鲁迅研究概况

□杨杰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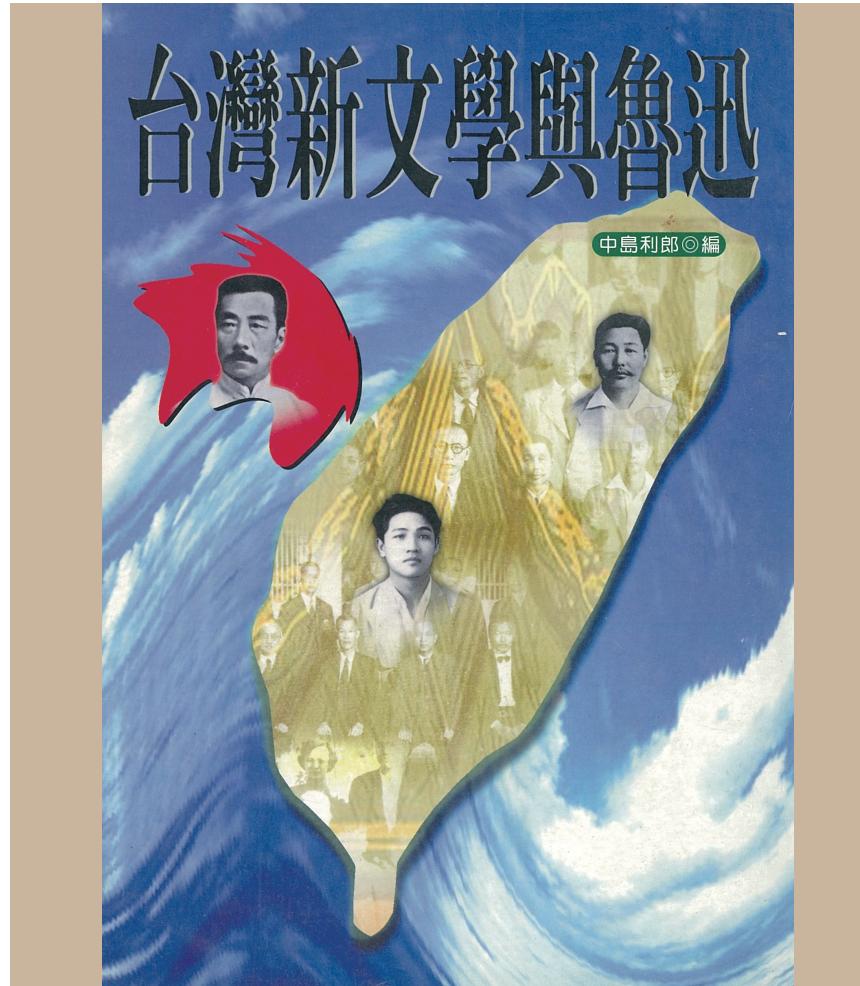
表。解严之后废除出版法，台湾正式走向出版的自由。虽然政治环境逐步开放，台湾也开始正视鲁迅对台湾的影响，但是，台湾超过30年时间的禁制鲁迅书籍，造成读者对鲁迅作品的陌生。此外，鲁迅作品对年轻人来说，阅读上的沉重、晦涩，更是导致鲁迅著作宛如稀世珍品般的仅是存在于图书馆的书架上。加之台湾的中学、大学强调四书五经、古典文学欣赏的美学传统，更让鲁迅一直无法进入青年朋友的阅读视域中。鲁迅究竟是谁，鲁迅被夹杂在还未散去的历史阴霾中，被遗弃在学校教育的大门外。

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的发展，让政局在2000年第一次轮替。在应被视为本土论述高涨的年代里，强调本土的前卫出版社与台湾、日本学者共同合作出版了《台湾新文学与鲁迅》，该书旨在讨论鲁迅与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关系。这样的讨论不但并没有将台湾本土文学发展“去中国化”，反倒更进一步深化梳理了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复杂的牵扯与关联。也就是说，当台湾迈向21世纪时，学术圈摆脱过往意识形态的包袱，开始以中性、客观的态度重新阅读鲁迅，解释鲁迅与台湾文学的发展。

《台湾新文学与鲁迅》是台湾第一本研究鲁迅在台传播与影响的专著，通过此书的讨论可以理解鲁迅对台湾的影响，并且呈现出鲁迅的著作在台湾新文学中所扮演的领航角色。尽管此书以合集的形式出版，文章的内容之间没有严谨的一体性，但透过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可以发现鲁迅思想与台湾文学发展的密不可分，包括日治时期的作家赖和、钟理和都受到鲁迅的影响，他们的小说创作有许多概念都是借由鲁迅的作品转化而来。

根据台湾硕、博士论文查询系统统计，该书2000年出版至今已超过46次被硕、博士论文参考、引用。当然，这其中有许多论文并非研究鲁迅，但这种转载、讨论，表明了鲁迅与台湾的关系受到学界相当程度的关注。鲁迅所代表的中国新文学的火种是如何被传递、演绎，这问题2000年后在台湾成为了热门话题。

对于这一议题研究的硕、博士论文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部分研究者着重于鲁迅对个别作家的影响，像张燕萍的《人间的条件——钟理和文学里的鲁迅》(2001)、黄惠祯的《左翼批判精神的链接：



40年代杨绛文学与思想的历史研究》

(2003)、王万睿的《殖民统治与差异认同一——张文环与钟理和乡土主体的承继》(2003)等。另外也有一类研究鲁迅思想与台湾之间关系的论文，包括：徐秀慧《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2002)、杨杰铭《鲁迅思想在台传播与辩证(1923~1949)——一个精神史的侧面》(2008)、柯乔文《“五四”与台湾文学文化运动(1915~1945)》(2009)等。从上述罗列文献可以了解《台湾新文学与鲁迅》的出版对台湾学界所造成的影响，尽管研究者以不同的角度切入，但“鲁迅研究在台湾”此一问题已成为台湾学术

界所热门讨论的话题。

21世纪以后，台湾的鲁迅研究，早已摆脱过去以意识形态为主的研究方法，取而代之的是借由日本与中国大陆两条研究脉络作为思想资源对鲁迅研究进行反省与再思考。《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出版后，台湾的鲁迅研究主流从过往的“意识形态立场”转向更为中性的“思考鲁迅对台湾影响”的学理视域。虽然这一议题的思考不见得以鲁迅为研究重心，但“鲁迅与台湾的关系”却是这些研究者在论文中不断思索、讨论的问题。

(作者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编辑出版《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的始末和杂感

□卢 坡



贵、高旭东、杨剑龙等先生成为我们的第一批作者。

书稿来了，需要处理，处理稿件是最能体现编辑价值的地方，而这项工作对编辑有着很高的要求。编辑加工稿件一般都从大处着眼，如这本书的书名是否可以更凝练、贴切，书中的每一编是否可以起一个更准确的编名等问题；但编辑加工稿件也有需要从小处着眼的地方，如这条引文是否正确，全书的格式是否统一等问题，甚至还包括全书是用1981年版《鲁迅全集》还是2005年版《鲁迅全集》这种统一版本的问题。

经过充分沟通、仔细琢磨，最终确定的书名分别为：《荒野过客：鲁迅精神世界探论》(孙玉石卷)《活着的鲁迅》(钱理群卷)《鲁迅文化血脉还原》(杨义卷)《中国需要鲁迅》(王富仁卷)《鲁海梦游》(张梦阳卷)《鲁迅与现代中国》(孙郁卷)《孤独者的呐喊》(黄健卷)《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庸》(张福贵卷)《跨文化视野中的鲁迅》(高旭东卷)《鲁迅的乡土世界》(杨剑龙卷)。

从2011年4月到2013年4月，整整两年，我一直在向鲁迅学习，向深受鲁迅影响的诸位先生学习。我买来了《鲁迅全集》，一有闲暇，就随意翻看，尽管我不是学习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也没有想过要写鲁迅方面的文章。但鲁迅关注现实、干预现实的精神，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风骨，敏锐观察、认真做事的态度，良好的艺术感悟能力、开阔的视野，以及给予他人特别是年轻人无私帮助，等等，都让我深受感动。给我最大触动的是鲁迅“历史中间物”精神。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说：“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10多年前刚读大学的时候似乎读过鲁迅的这段话，当时只是觉得鲁迅接受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并未有何特别的超出一般人的见解。10年后因为编辑的行业，我又认真看了鲁迅研究专家关于鲁迅“中间物”精神的阐发，其中收获是很大的。钱理群先生认为他作为“中间物”的具体化，就是“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钱先生确实是这样做的；套用钱先生的表述，与我而言，作为“中间物”的具体化，就是“做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做编辑就显得心平气和而不会牢骚满腹，工作起来也不会拈轻避重，不会有得过且过、蒙混过关的想法。甚至对一般常说的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的说法，我也有了新的理解和并不完全赞同的认识。就编辑“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而言，我是有收获的，而且这收获还是沉甸甸的。这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精神感染的力量、榜样的力量，远比规章制度、甚至是外在的强制力更能让人自觉、催人上进。鲁迅研究已有100年了，我们除了要向为民族自强不停呐喊的鲁迅先生致敬，也应当向一直弘扬鲁迅精神、传播鲁迅思想的那些可敬者们表示我们的敬意。

(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大学出版社编辑)